



# 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

作者：弗弘索·鄂达 序：

弘索·鄂达及巴姬·黛芭





2011 年 11 月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

Avenue Michel-Ange 11

1000 Brussels

Belgium

电邮: [info@rosalux-europa.info](mailto:info@rosalux-europa.info)

中文翻译: 李

俊妮、周思中

编辑:

Renato Sabbadini

图片:

Oswaldo Guayasamin 的作品《El abrazo》(封面)、《Los amantes》(封底)

版权: 厄瓜多尔, 基多, Fundación Guayasamín

# 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

作者：弗弘索·鄂达 序：弗  
弘索·鄂达及巴姬·黛芭

本文由弗弘索·鄂达撰写，于 2011 年 4 月 28 - 29 日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主办的「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会议上由法兰仙尔·万斯坎（Francine Mestrum）读出，并于会议后作出修改。此文亦作为一份提交予基多 IAEN（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Nacionales）和厄瓜多尔外交部的文件的基础。

## 目录

目录 .....	4
序 .....	5
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 .....	7
1. 前言 .....	7
2. 为何把「公共财产」和「人类共善」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	7
3. 多面向的危机 .....	8
3.1 不同的危机 .....	9
3.1.1 金融及经济危机 .....	9
3.1.2 粮食危机 .....	10
3.1.3 能源危机 .....	10
3.1.4 气候危机 .....	12
3.2 有何解决方法? .....	13
3.2.1 改变行动者, 而非制度 .....	13
3.2.2 建立监管制度 .....	13
3.2.3 为现行模式寻找替代方案 .....	14
4. 新范式 .....	15
4.1 重新定义与大自然的关系: 由剥削到崇敬作为生命之源的大自然 .....	16
4.2 重新强调生活必需的生产, 强调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 .....	19
4.3 重整集体生活: 社会关系及制度的普遍民主化 .....	21
4.4 确立相互文化主义, 共建普世共善 .....	22
5. 以「人类共善」作为全球目标 .....	23
6. 迈向关于人类共善的共同宣言 .....	25
7. 参考书目 .....	26

# 序

危机一个接一个，我们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

巴姬·黛芭（Birgit Daiber）及弗弘索·鄔达（François Houtart）

我们真的必须以发展之名而破坏地球？经济增长是否必然牺牲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挽救经济需 要以青年失业为代价？连串的危机、对新自由主义偏执的追求、普遍存在的不公义：凡此种种皆都对人类提出根本的拷问。在世界各地，愤懑持续加剧。被压迫者的呼喊在大地之母的 哽咽间回荡。

解决危机的措施持续失效：2009 年，于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及其后的会议没法产生具约束力的决定。联合国于金融及经济危机的会议里，管制破坏性金融投机资本的建议无人 问津。

采取行动的時刻到来了，我们要为此开发展新的想法。然而，修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障 碍、宣扬绿色资本主义、监管金融市场、以发放援助的方式对抗贫困、制定越来越军事化的安 全系统以及惩处异见者，都只是调适现行制度的方法。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彻底的改变、另一 个典范：换句话说， 人类在地球生活一个根本的新方向。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自食其果，它的毁灭性已然超过它所能创造的。我们务必要建立替代方案 。大多数人生活于困惑之中。即使所有迹象都指向相反的结果，大量政客仍宣称危机正逐步结束 。被 认为是进步的政党变成危机的经理人。道德机构只自限于谴责滥权渎职，却没有指出造成 危机的原因又或谴责系统的逻辑。大范围的经济不稳，倾向令人固守他们努力所得来的，而非 冒险作出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必须分析，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不是一小撮专家的任务，而是我 们所有人的任务。我们何去何从？要回答这问题，我们需要于行动和思考之间，建立双向的辩 证。

为此，我们来看看那些已经肩负起这项新挑战的运动和计划。欧洲的「愤怒者」运动、美国的占 领华尔街运动、全球正义网络、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无地农民及小农运动，以及北非和阿 拉伯国家的民主运动，皆表达了对新视角的探索。可作楷模的计划如拉丁美洲的新区域发展银 行，即南方银行（Banco del Sur）；以及拉美国家之间新的防止投机交易系统，即苏克雷 （the Sucre），印度保障小农收入的计划（NREGA），东南亚地区改进社会保障的网络 （NTSP），还有其他在地的和区域性的计划都显示，尽管困难重重，但人们不会再浪费时间 ， 并且有决心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奋斗。

这本小册子提出了对危机的分析，还有对未来的展望。它考虑到数以百计预示人类共同利益 的新典范：即人类共善，亦即具备无穷的文化表达，及在一个公正的社会跟自然和谐共处— —换句话说，就是呼吁一个值得致力投身的乌托邦。但如若这个不只停留在幻想，人类共善必

须被翻译为实质的措辞。理论的导向必须指引我们日常的生活，但它们必须不断更新而与人民的抗争经验同步。

此刻正是时候，提出一个可作为大家讨论的思考基础，指导我们的行动，凝聚大家的思考，也作为一个汇合不同运动的基础，藉此改变人类于地球共同生活的坐标。这是长远的工作，但需要实时的决心。下一步将会是辨别行动者及制定策略——不是重塑已存在的，而是给新力量予那些正朝向人类共善的抗争和计划。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布鲁塞尔 / 基多，2011 年 11 月 30 日

# 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

弗弘索·鄂达

## 1. 前言

由于社会越趋分裂、缺乏对公义的尊重、青年人失业、权力的滥用，以及破坏大自然，世界各地正陷于深刻的不安之中。新一浪的社会运动经已出现。社会论坛造就了他们的全球化。「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的集体社会意识正到处扩散。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政治、文化和心理上所造成的后果，正是社会失衡的根源。必需刻不容缓的寻找解决方案，而不只是改善旧有的模式，此刻正是提出新方向的时候了。反省并集结改变的力量，成为了当务之急。

意大利民众对有关水源（公共财产的一种）的全民公投，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于 2011 年 4 月，在罗马主办了一个名为「从「公共财产」（Common Goods）到「人类共善」（Common Good of Humanity）」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对「公共财产」和「人类共善」，这两个概念的连系进行仔细的省察，以及融合不同改变社会的要求及社会抗争。

## 2. 为何把「公共财产」和「人类共善」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目前，对「公共财产」的辩护乃是许多社会运动的首要事项。「公共财产」包括了诸如水和种子等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以及不论在南半球或北半球，今天都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所瓦解的「公共事业」。抗争由许多影响公用事业和网络的私有化浪潮（包括铁路、电力、水、运输、电讯、木材、河流和土地，以至到健康和教育）所组成。资本主义以前，在英国所谓的「公共财」<sup>1</sup>已逐渐消亡而让路给把生活各方面都商品化的经济系统里——此乃资本累积的必经之路，当下则由金融资本的主导所强调。公共土地被认为是荒废的土地，与及其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用途都被视为「没有效用」（Michael Brie, 2011）。

要清楚的是，重新评定不论甚么形式的「公共财产」（国有化或是以其他集体控制的形式），首要目的就是要突破以消灭大部份公营部门为目标，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私人项目发展的自由，并而长时期强调私人 and 个体的经济逻辑。我们已经走到连生命本身都被商品化的地步。不透过国有化的操作拯救金融系统，反而还把它交给本来该要为危机制造负上责任的人手里（事件中只有少数人被起诉），新的经济逻辑由此牢牢掌握政治领域，这于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尤其明显。此等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紧缩措施，普通市民为此付出代价，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维持。

对公共事业以及「公共财产」的守护，形成对这些政策的一些抗争，如果抗争并不可见于更广阔的层面——对人类共善的抗争，即地球及人类生命的抗争——便很容易沦为无望的斗争。的确，甚至连世界银行这些机构都会提出恢复一些特定的公共事业的建议。一些顶级生意人也会持相同的意见，因为他们看见私有化并不一定如预期中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sup>1</sup>公共财在十三世纪的英国乃指农民的公地，后来透过圈地运动使土地逐渐变为地主的私人产业——以围栏筑起来的土地，专门用作养羊。此举激发众多起义。

考虑到我们当前面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人类共善」这概念的进路看来容或过于理论化。尽管如此，它可以作为一个对应当代问题有用的工具，例如我们所面对的众多危机，与及聚合一众对抗破坏自然和社会制度的计划及斗争。它涉及非常具体的现实，首先是团结，它不断被竞争性及个人主义所削弱；还有利他主义、对大自然的尊重、温柔，总的来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构成元素。

让我们由危机与及其各方面开始，尝试勾勒其系统性。这让我们得以观照「公共财产」的问题，并从新观点去看「共同利益」（Common Good）（与之相反的是个人利益（Individual Good）），结合成「人类共善」的视角。继而，我们需重新认识人类在地球集体生活的范式，强调这进路在国内及国际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实践面向，并以一个「人类共善普世宣言」的建议作结。

让我们回到这些概念。第一，即是之前提及的「公共财产」。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全人类（不分男女）一起分享的「共享利益」。在他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除非有些东西能够互相分享——虽然他也认为这越少越好<sup>2</sup>——否则社会不可能存在。然而，我们无意从哲学层面探讨这问题，倒是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探究——亦即去考察目前「人类共善」这观念如何定位。事实上，这第三个概念由于其更普遍的性质，故有别于「公共财产」，它亦涉及人类在地球集体生活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生活必需的生产、集体组织（政治），与及现实的诠释、评估及表达（文化）。「公共财产」并不是人类遗产的问题，反之，它是一个关于人类福祉（of well-being）、过好活（*buen vivir*）的状态，它是众多参数结合起来管治人类在地球生活的结果。它也不是相对于「个人利益」，以及国家建构范式下所定义的「共同利益」

（common good），亦即「公共生活（*res publica*）」——虽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9年的报告都引进「普世共同利益」（Universal Common Goods）的概念。事实上，「人类共善」的概念包括了关于全人类在不同规模生产及再生产生命：总括来说，这关于生命的问题，及生命再生产自身的能力。

明显地，「人类共善」的概念包括了如目前所理解的「公共财产」和「共同利益」的实际构想。如我们以当下的危机开始反思，理由简单不过，因为这危机不仅糟塌「公共财产」和「共同利益」，被波及的还包括人类在地球的生存，以及大自然自我复原的能力，之所谓「人类共善」。因此，必需逼切地检视这场危机的本质。事实上，正是累积的冲动由十三世纪开始破坏欧洲的「公共财产」。今天，为了工业化农业（尤其农作燃料）及采矿业，土地的掠夺正在南方大陆持续进行，这是「圈地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同样的逻辑，无论于资本主义的中心又或边缘地区，都同样损害着「人类共善」。现今盛行的是死亡逻辑，而不是生命逻辑。解决问题，我们必需究其本：亦即是说，我们今天必须重新定义构筑人类共同善的条件。因此我们需要从描绘危机的根本性及系统性质开始，及其主要的元素。

### 3. 多方面的危机

全球超过9亿的人生活于贫穷线之下，而数字还在持续上升（UNDP, 2010）；同时每24小时，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及其衍生的后果而死亡；日复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及文化正逐渐消失，人类珍贵的遗产岌岌可危；男女的不平等继续被形式及非形式的经济系统所巩固；气候不断变差；当这些都同时发生，就已不能单单说是偶合的金融危机，尽管危机早于

<sup>2</sup>佩特雷拉（Riccardo Petrella）把饱受新自由主义及市场主导观所挑战的「公共财产」重新引介回进步思想中。（1998）。他的观点建基于包括资产、文化、民主和土地的「新世界社会契约」。根据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于原则的制定，以及建立适当的监管、制度及文化的问题。

2008 年已经猛烈爆发。

### 3.1 不同的危机

#### 3.1.1 金融及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事实上已远超过它源头的边界，并且动摇了经济的根基。失业、生活成本上升、最贫穷的人遭受社会排斥、中产阶级的脆弱：全球受害者的数字正在增长。它不是突然发生的一些意外，也不是一些需被惩处的经济人的滥权所造成的局面。我们正面对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历史一直持续着的逻辑（**Fernand Braudel, 1969, Immanuel Wallerstein, 2000, István Mészáros, 2008, Wim Dierckxsens, 2011**）。从危机到监管、再由解除管制到危机一再发生，不断发生的事件从来都受制于利润率的压力：当利润率上升，经济规管就会放宽；下降时，管制就会增加——但无论怎样，情况永远都是有利的被视为经济增长引擎的资本累积。我们眼前所见的并不新鲜，这不是金融体制第一次发生的危机，而许多人也认为，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可是，多得新颖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这几十年来来的金融泡沫，令问题的严重性变得难以估算。我们都知道，危机的爆发是始自美国次贷的现象：即是，几百万人无力偿还债务，但这些支不抵债的情况却一度被伪装成各重金融的衍生工具（**Reinaldo A. Carcanholo and Mauricio de S. Sabadini, 2009, 57**）。工业大国消费增长的速度超过收入的增幅（**Joseph Stiglitz, 2010, 12**）。可是，这个现象是个老问题，早在当虚拟经济变得比实体经济更为重要之时已经开始：换句话说，当金融资本开始比生产资本的的利润率更可观的时候已开始（**Jorge Beinstein, 2009, 29**）。根据史蒂格利兹的说法（**2010, 22**），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肇因，就是尼克松总统（**Nixon**）于 1972 年决定撤销金本位的政策。在国际经济越来越互相依赖的情况下框架内，各种新的货币政策应声而起（全球化）。

资本主义自早期便一直经历金融危机。18 世纪末是第一次，往后又不断重演。而于之后的日子不断再现，最近的一次世界性的，要数 1929/30 那一次。随着第二次大战结束，及后又发生了许多区域性危机（墨西哥、阿根廷、亚洲及俄罗斯）。处于体制中心的国家，2008 年新的世界金融危机触发了一系列的特别措施：国家负债、信贷限制、紧缩政策等等。但南方国家也受到影响，例如中国的出口减少、对中南美洲、菲律宾等国家的汇款减少、以及油价上涨等等。此等国家虽然破产问题较不严重，他们有些甚至能从天然资源价格上升中获益，并能累积重要的货币资源。然而，至少从能源而言，这造成了产油国及非产油国之间的不平衡。从粮食生产的问题而言，最受价格上涨打击的人，就是消费力低者，当中尤以女性为甚。

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逻辑本身（**Rémy Herrera and Paulo Nakatani, 2009, 39**）。若然资本被认为是经济的引擎，而资本累积又是发展的核心，那么，利润的最大化就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经济的金融化加速了盈利增长的幅度，而又如果投机炒卖加速了这个现象的话，整体的经济组织模式就会朝着相同的方向走去。所以。这个逻辑的第一个特征——亦即以盈利率的增长作为资本累积中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受监管的资本市场无可避免会导至危机。正如联合国一份委员会报告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宏观经济的危机」（**Joseph Stiglitz, 2010, 195**）。

这与 1930 年代危机的背景类似，可是，最主要的分别在于当前的金融和货币失衡还结合了在粮食、能源和气候等领域的危机：所有这一切，都是源于同一经济逻辑。

### 3.1.2 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共有两方面。第一个是不同短期因素的结合，另一个就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前者可见诸 2007 年及 2008 年粮食价格突然飙升。当然这个现象可以归咎于例如储备萎缩等的几个原因，但主要的成因乃是投机活动，而农作燃料生产更要负上部份责任（例如美国所生产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所以，两年内，小麦的价格在芝加哥股票交易市场有 100% 的升幅，玉米和乙醇则分别为 98% 及 80%。近年，由于预期食品生产会有快速而且丰厚的利润，大量的投机资本皆从别处转移至粮食生产上。结果，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总干事形容，于 2008 年及 2009 年，每年皆有超过 50 万人跌入贫穷线之下，而贫穷人口的总数亦攀升至前所未有的 10 亿人以上。这显然是利润逻辑、资本主义价值法则所造成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结构性的问题。过去几年，单一种植不断扩张，导致农地集约——亦即是说，名副其实的逆向土地改革。以生产力低为名，世界各地的农民及家庭农业不断被消灭。的确，以一时一刻的表现而言，单一种植的生产力比农民农业高出五百甚至一千倍。然而，必需注意两项因素：第一，这种生产方式正带来生态破坏。它砍伐森林、大量使用化肥而污染泥土、河流和海洋。于接下来的 50 - 75 年，我们将会为未来制造沙漠。第二，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数以几百万计的农民因而迁徙到城市的贫民窟，加重妇女的工作，造成城市的危机，或者像在巴西一样，增加内部移民的压力，又或者迁移到其他国家去（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西非）。

当其他工业生产资本的利润相对下降，需要寻找新利润来源的金融资本大增，农业现已与公用事业一样，也成为资本新开发的领域（Samir Amin, 2004）。近来，我们又目击了前所未有的现象，那就是：国家及私人资本对土地（尤其非洲）的掠夺，以用作粮食及农作燃料的生产。南韩的大宇集团（Daewoo）于非洲马达加斯加，获得一项面积达 1,200,000 公顷，为期 99 年的土地特许权。这引发该国严重的政治危机，协议最终要作修改。如利比亚、亚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于非洲的马里及其他非洲小国正在进行相似的工作。至于欧洲及北美洲的矿业和农作能源的跨国企业，一如中国的国营及民营企业，亦尝试找寻机会长时间开发数以百万公顷的土地。

很少人会关注此等举措对生态及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亦即所谓「外在成本」，不包括在市场计算之内的因素。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继追求盈利率增长之后的第二个特征。即使是核心国家，资本并不处理负面影响，后果往往都是当地的社会和个人承担。这个向来就是资本的策略，无论对工人阶级的命运，或在殖民统治下的边缘国家的人民，资本都漠不关心；同理，对于大自然和在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是置若罔闻。正是由于这偶合性及结构性的双重原因，粮食危机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逻辑之上。

**3.1.3 能源危机** 现在让我们看看能源危机。天然资源正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过度开发，但问题远超过目下的

石油价格暴升，它更是耗尽天然资源的帮凶之一。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接下来的 50 年，人类一定要改变能源的生产来源，从化石燃料转移至其他的来源。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在近代「华盛顿共识」的年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标志，象征普遍放宽对经济的限制），

非理性的能源使用、自然资源的浪费，变得越来越明显。

个人在房屋及交通的消费等对能源贪婪的苛索，是这个模式最典型的例子。不止如此，放宽外贸正造成我们超过 60% 的商品越洋过海，这意味使用大量能源以及污染海洋。超过 22000 只 300 吨以上的船，每天在海上航行（M. Ruiz de Elvira, 2010）。这规模的航运确保了可观的商品交换，却与边陲生产原材料及农业商品的国家延续了不平等交易的原则。它也最大化了「比较优势」：不管货品需要走几千公里路，都可确保货品的价格便宜，这是因为工人被剥削得更严重，而且保护生态的法律都不存在又或是担惊受怕。

石油、天然气，以及铀的产量于何时达到顶峰，当然众说纷云，但我们都知道这些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日子亦不远矣。在例如美国、英国、墨西哥及其他国家，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无可避免地，当这些资源被耗尽，其价格将上升，一切相关的社会及政治后果亦会恶化。对工业大国而言，对化石燃料及其他战略性原材料的全球性控制便越来越重要，以至她们也毫不犹豫诉诸军事力量来确保控制。美国的军事基地地图清楚的表明这点，而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就证明其事。美国的军费相当于所有全球其余所有国家军费总和的一半，她担演着全球系统担保人的角色便呼之欲出。没有一个国家，例如英国、俄罗斯、中国在军事上的支出有美国四分之一。很清楚的，这不单是控制能源的来源，更加是确保整体经济模式能够得以存续。

农作燃料的问题必需在未来能源短缺的脉络下检视。由于需求持续增长，及石化燃料可预期的减少，找出解决方法乃相当急切。由于新的能源所需的技术发展在此刻还未足够成熟（如太阳能和氢能），亦由于其他的解决方法（例如风能）虽很有意思，但却只是微不足道或经济上没利可图，农作燃料相比起就较吸引（François Houtart, 2009）。它们通常被称为生物燃料，因为基本的材料是生物，跟石化燃料的物质是无生命的有所不同。然而，农民运动特别针对这术语，事关大量生产农作能源实际上无异于摧毁自然和人类的生命。

农作燃料的解决方案曾一度获得生态组织及运动的支持，但它却被商界领袖所否定。大约 2000 年中期，后者的态度有所改变。经验显示，以巴西的蔗糖和美国的玉米生产乙醇所需要的技术证实是相对简单的。情况跟以油棕、黄豆以及其他产油植物如白油桐（即麻疯树）生产农作柴油一样。在巴西对乙醇需求的热潮始于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乙醇使得巴西能减少入口昂贵的原油。在美国，由于其他国家的供应不可靠，所以就得减少对外来石油供应的倚赖。即使玉米产出的农作燃料较蔗糖为少，但这正好解释为何政府大规模补贴乙醇的生产。

部份国家已经开始为整体能源使用立法规定一定比率的「绿色能源」。欧盟决定于 2020 年的比率需为 20%，其中 10% 需为绿色液态能源，亦即农作燃料。这个计划意味几百万公顷的土地将会转变成农作燃料生产之用。实际上，以欧洲国家（美国亦然）的能源用量来说，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满足这需求。结果，到了 21 世纪的头 10 年，她们便对南方大陆大量未开垦的土地虎视眈眈了。

农作燃料以单一种植的方式生产，亦即利用广大面积的土地种植单一作物。如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许多例子所显示，这意味着大规模砍伐森林。不用 20 年，这些国家 80% 的原始森林已为种植油棕树及桉树而被砍伐。生物多样性消失了，对生态永续造成可怕的后果。种植这些作物不单要用大量的水，而且还需要施加大量的化学肥料及农药。结果，被严重污染的地下水及河水流进大海。更甚是，小型土地拥有者被驱逐，大量土著被夺去祖先留下来的土地，造成无数社会冲突甚至暴力事件。如果按照现在的计划一直至 2020 年，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

洲地区将会有以几千万公顷计的土地转作农作燃料的单一种植——而全球近十亿饥饿的人口大多来自这些地区。一切就为了增加微不足道的能源供应。

为推行这些计划，一方面，我们会见到金融和投机资金进入这些行业；另一方面，在非洲尤其明显，新一轮土地掠夺。位于北非的几内亚比绍，为了生产农作柴油，有计划投入 500,000 公顷的土地——占全国面积七份一——作种植白油桐之用。资本将会来自澳门的赌场

（一如几内亚比绍，葡萄牙语于澳门流通，有助商业谈判）。总理是负责此项目的银行的主要股东。直到目前为止，农民的反抗与及对几个部门（包括总理办公室）的质疑令计划暂时搁置，但这也只是暂时性。数十个相类似的项目正在例如坦桑尼亚、多哥、贝宁、喀麦隆、刚果和肯尼亚等其他国家发生。

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欧洲理事会主席拉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和欧盟主席巴洛佐（José Manuel Barroso）于 2010 年 10 月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巴西的技术及欧洲的资金共同开发莫桑比克 4,800,000 公顷的甘蔗种植场（占全国耕地七份之一），为欧洲供应乙醇。这计划将确保欧洲实现其使用「绿色」能源的目标，却不太关心对该国自然环境和人口的影响。

农作燃料的发展，体现着资本主义逻辑的特征，忽视生态和社会的「外在成本」。它基于短期的计算，不把市场没有承担的成本计算在内，而这些成本就是由大自然、社会和个人来承担。这些做法亦符合金融资本累积的法则和切身的利益。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计划。

### 3.1.4 气候危机

得力于联合国各种关于气候、生物多样性以及冰川等等的会议，让我们对气候危机有充分的认识，而每天的信息也越来越准确。在这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状况。现行的发展模式是不断排放温室气体（尤其二氧化碳），大自然里吸收温室气体的碳汇（特别是森林和海洋）正不断被摧毁。此外，通过大规模使用化工产品、单一种植，开采如石油、天然气和矿物等自然资源，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最终祸及气候。

还有两个方面是从来没有被充分强调的。首先是「生态债务」。打从商贸资本主义开始以来，南方国家的天然资源被大肆开采，人力及生态资源均付出了严重的代价。此等掠夺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全由殖民地区来承担。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改变这种剥削关系的逻辑。过去几年，为了满足北方国家的需求，掠夺土地以及过度开采矿材正在加速，造成生态灾难以至社会冲突。因此，生态债务必须被算进南方国家的私人及公共外债。开采南方国家所得的物品的消费者，唯有承担起这些生态和社会损害所造成的「外在」成本，才算是公平。实质上，消费者无异于缔结了债项。另一个造成生态成本的，就是军事活动。首先，战争是极其浪费的，而且轰炸、化学物品<sup>3</sup>的使用，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均对生态造成破坏。此外，军备的生产包含使用消耗地球上的天然财富，而生产过程也排放温室气体。每年约 10,000 亿的军事支出，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生态系统破坏。

地球持续暖化，海面水平上升。我们生态的足印是如此巨大。根据一家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机构指出，地球大概在 2010 年 8 月的中旬已经耗尽了它自然地自我更新的能力。由于地球只有一个，这意味着此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外，根据史特恩博士（Dr. Nicholas Stern）早

<sup>3</sup>越战期间，美军用橙剂破坏森林，打击南越游击队根据地。此化学物品甚至于 40 年后的今天，依然造成巨大的伤害，数以千计初生婴儿因有毒物质的累积而导致畸形。

在 2006 年给英国政府的报告所指，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本世纪的中叶，将会产生 150 至 200 亿的气候难民（Nicholas Stern, 2006）。更多最新的统计甚至显示更高的数目。

所有这些都显露了财富集中的景观，经济及政治的决策者都身处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指出，世上 20%的人口消耗了地球 80%的经济资源。的确，在过去几十年，数以百万计人口已经达到一定的消费水平，但他们在全球 70 亿人口当中只占少数。那 20%较富有的人的购买力，对资本的再造是非常有用，并且为金融衍生物提供了一个出口。其余的人，就如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所说，是「多余的数十亿人」（S. George, 1999）。事实上，他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贡献，亦缺乏购买能力。正如世界银行也承认，贫富的差距不断上升（World Bank Report, 2006）<sup>4</sup>。正正由于这些动荡，这发展模式全球性地陷入危机。失控的都市化、国家陷入危机、以暴力解决冲突越见频繁。诸如此类的表达，令有些人说，文明已出现危机。要从全球的动荡不安把自己解救过来，我们显然需要解决的方法。对于问题的不同见解，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别。

## 3.2 有何解决方法？

### 3.2.1 改变行动者，而非制度

某些特别关注金融危机的人，赞成严斥并撤换那些直接要为造成经济乱局负责的人。前国际货币基金总监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称这些人为「偷鸡贼」。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从所有危机中看到有利的征象，藉此消除衰弱或腐败的元素，从而在更健全的基础上恢复积累。对他来说，要更换的是行动者而不是系统。

### 3.2.2 建立监管制度

第二个建议是监管规则。市场是公认不会自我监管的，需要有国家和国际机构承担这任务。政府以及特定的国际机构应该介入监管。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在法国和天主教企业家谈到市场的三只手：市场的「无形之手」和国家监管的手，而慈善机构的介入，就是要保障那些无法从另外两只手得益的受害者。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乃其中一位此领域的理论家。在此意义下，「新凯恩斯主义」就被应用于当前的情况。为了令资本能够再造，对系统的监管无异于挽救它，并因而重新定义国家及国际机构等的公共机构的角色。这是新自由主义似乎自 1970 年代起便忘记了的事（Ernesto Molina Molina, 2010, 25）。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实质建议。例如，八大工业国集团（G8）建议对世界经济体系作出一定程度的监管，但性质都失诸无关痛痒和暂时性。反之，联合国国际金融及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更前进的监管措施。例如，建议成立一个常设并与联合国安理会看齐的联合国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以及一个国际专家小组，恒常地监察全球经济形势。其他建议包括废除避税港和银行保密制度，要求银行加大储备金额和对评级机构有更严格的管制。另外，还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一个意义深长的改革建议，与及建立区域货币，不再以美元作为世上唯一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按委员会的报告，这一切皆着眼于推动「创新和强劲的增长」。这些都是反对目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措施。可惜，联合国于 2009 年 6 月的会议上只通过少数谨慎的措施，而且很快就被西方强国打发掉。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Stiglitz Commission）在提出重整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监管时，也提及其他

<sup>4</sup>2010 年，正当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国内多数人口，法国首 500 名富豪的财富增加了 25%，由 1940 亿跃升到 2410 亿欧元（Manila Bulletin, 8 July 2011）。

诸如气候、能源和食物方面的危机，尽管它以「可持续」与否作判别的标准，但它对其目标的考虑还是未够深入。到底为谁修补经济系统？其发展模式会否只是一如既往地破坏环境和制造社会不公？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在货币及金融制度改革的建议，尽管很可能拯救我们脱离金融危机，甚至超越目前所有做过的，但这足以解决当前全球所面临的挑战吗？无论它拥有多少自我调节的方式，它依旧是在资本主义系统里寻找解决方法。资本主义虽然备有所有适应新环境的手段，但其残破不堪却是长期性的。要过渡到另一个完全不同基础的系统，当然需要监管，但相关的监管的前提，却需要为新局面创造条件，而非让系统小修小补以适应新处境。

### 3.2.3 为现行模式寻找替代方案

第三种进路在此便显得必需：它需拷问发展模式本身。当前所变得严峻的危机都是同一根本逻辑的后果：一）它所设想的发展完全妄顾环境和社会破坏等「外在成本」；二）它假设地球有无穷尽的资源；三）它视交换价值高于使用价值；四）它把经济等同于盈利率及资本累积，从而造成莫大的不平等。这模式处于全球财富惊人发展的源头，但却由于其为大自然带来的破坏及为社会带来的不平等，经已完成历史任务。它无法再自我复制，或以当代的语汇来说，它不可持续。戴亚克辛斯（Wim Dierckxsens）评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不但倾向剥夺世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它甚至毁灭环绕我们的自然生态（2011）」。

阿根廷经济学家拜恩斯坦（Jorge Beinstein）指出，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四十年由于生产部门下降已经走向全球性的衰落，它只不过是以人为的金融业发展以及庞大的军费作为掩饰（J.Beinstein, 2009, 13）。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只讲监管，我们是要另寻出路。这不应只是纯粹理论反思的结果，反之，它必须通往实质的长中短期政策。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现今经由全球化，及其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层面而大行其道，定义着集体生活的基本范式，若提出另类方案，也就即是要检视人类在地球集体生活的根本范式。此范式由四个元素所组成，之所谓根本，是因为从远古至现在，它们都是所有社会组成的重要部分。让我们扼要说明一下：一）跟自然的关系；二）物质、文化、精神上等基本生活元素的生产；三）社会及政治的集体组织；及四）对现实的分析及文化建构中行动者的自我参与。这是每个社会都要达至的目标。

目前，指导当代世界构建的范式，可以总括为：现代性。这是欧洲社会及文化巨大变化的结果，也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定义自身的范式。无可否认，它代表某一种进步（Bolívar Echevarría, 2001）。然而，现代性并非偶然衍生或无中生有的社会抽象概念，它关乎人类在地球的集体生活，其物质和社会基础，及思想的生产模式。它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同时在辩证过程中又体现了自身的矛盾。个人、人权、民主理念的解放，科学的进步及其技术应用皆是现代性的产物。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的霸权及其施加的法则，令这些进步沦为残酷地持续了五个世纪的特权阶级和殖民地关系。一些社会的抗争，令一些从属的群体在资本主义范式不变的前提下，尝到了现代性的好处。在自身矛盾中，后者现在还反过来危害那四个人类在地球集体生活的基本要素。由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已然存在了隔阂，现代性范式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采，亦即是对生命之源，大地母亲的摧毁。它产生了以入侵生活所有面向为逻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里，这种观念造成雅各布宾式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文化领域里，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成为伦理律令，还有人类无止境的进步概念、耗之不尽的地球资源，科学和技术能解决所有生活矛盾的幻想。现代性为包括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基本坐标。

这计划的全球主导性于早期已经显而易见。通过对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消灭、吸纳或招降；通过不同殖民主义的南征北讨、通过建立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以及通过现在的「全球化」，最终把增长和西化的概念凝聚一起，亦即是说，令资本的最新形式和霸权在全球扩散。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乃是对此模式的一种反动。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展的这种思维模式，其实也只限于在文化及政治的层面，揉合一些对现代性的模糊批判（M. Maffesoli, 1990）。他们认为，历史的概念是个别行动者一时一刻的建构、拒绝承认各种结构的存在、否认以直线的因果关系定义各种系统的现实，以及对各种人文科学的明确拒斥，都令这股思潮仿佛成为了现代性的私生子，人亦因而变得去政治化。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后现代主义将自身转化成一种轻省便利的意识形态。当资本主义还汲汲地为成为「世界系统」寻找新的物质基础时，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称，拒绝承认系统的存在对提倡「华盛顿共识」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批判现代性当然非常重要，但需要取历史和辩证的（权力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进路，并且渴望恢复欧洲历史曾经昙花一现的解放本质。当然不能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抽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是不知所云的。

这是为什么必须从哲学、物理、生物以及社会科学此等不同人类思潮的贡献，重建一个贯彻的理论框架。重点是在创造新范式时，为每个新计划在整体里定位，因为这会让看来个别的行动凝聚在一起，否则就会落得如实证主义般各元素之间互不相关。在国际政治上，这也是有效的。

如上述，人类在地球集体生活的基础有四个方面：与自然的关系、基本经济生活的生产、社会和政治上的集体组织，对现实的诠释和象征性表达。实现新范式的这四方面，便可称为达至人类共善，亦即是我们一再重复，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历史条件不断变化，这目标需要持续追求的，而没有一劳永逸的定义。然而，当前的危机需要基进的再思，需要直面问题的根源（István Mészáros, 2008, 86），而这意味一个与资本主义坐标彻底不同的范式。根据不同的思想传统，以及人民的集体生活经验，人类共善的概念已经以不同的途径表达，例如东方及美洲土著的哲学及宗教（the *Sumak Kawsay*, 或 *buen vivir*），还有马克思（Karl Marx）主义传统的普遍需求和能力的系统（A. Salamanca Serrano, 2011, p. 46 and S. Mercier-Jesa, 1982）。

## 4. 新范式

总括而言，现代性所表达的人类发展范式，就是假设地球资源耗之不尽，人类专享及控制无止境物质与科学进步，并能越来越随心所欲地得益于各式货品及服务。这种生活模式建基于竞争性经济（一种尤其雄性的特征）的有效性，但这模式由于各种社会及生态矛盾，目前已走到尽头。因而，我们需要基进的改变，以确保地球上的生命及长远人文精神的延续性。

这新的范式，从根本上倡议一种人与人之间、性别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均衡的动态，同时与自然融合一致，以促进生活及确保其再生产。这关乎到「过好活」，达至「人类共善」，亦即是重新开始尊重作为生命之源的大自然（大地之母）的整体性。

在人类集体生活涉及的基本元素中建设及应用[人类共善]，需要按步就班：并非单纯学术练习，而是在社会上能实现的；尤其以社会抗争而言，思考与实践经验有着同等核心的地位。任何社会抗争都对应着某种人类共善的失效，也是某种寻找解决方案的尝试。当破坏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地球上的各种经济、社会及文化都显出了其至高无上的力量时（虽然却未能彻底消灭经济、社会及文化等自身的特点），建基于自身社会特征及历史经验的重建工作，便是男性和女性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责任。在重述生活必需的条件这问题上，不应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事实上，这范式并非表面上如此新颖——关于对人类在地球上命运的全盘观点，从任何地球上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都可找到参考。许多宗教及哲学传统（道教、儒家、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及回教等）均表达了这种全盘观点，不少原住民的传统宗教亦然。问题在于如何以当代的语言，为多元的现代社会重新发现恰当的观点及具体的实践。

#### 4.1 重新定义与大自然的关系：由剥削到崇敬作为生命之源的大自然

现代文明对大自然的强力操控及高度都市化，已令人类忘记自己的生命归根究底需要依赖大自然。气候变化时而以非常残暴的方法提醒我们这一点，这亦意味着不能将地大自然视为一个可随意剥削的星球，亦不可将天然资源贬为可随意买卖的商品；大自然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在这意义下，大自然物理上及生物上的自我更新能力需要被尊重。而这亦意味着一个哲学性的激进改变：与大自然任何纯功利主义式的关系都需要被质疑。资本主义视生态破坏为附属的或无可避免——虽然也许发生得越少越好；更劣者，将生态破坏视为[外在成本]，由于这因素并不列在市场考虑，以至资本累积的计算之内。

有论者更进一步质疑以上观点的人类中心主义假设，并提出[大自然之权利]等新概念，巴西神学家李安纳度·波夫（Leonardo Boff）便曾在他的著作中捍卫这立场。正是在这基础上，联合国大会主席戴斯科托（Miguel D'Escoto），在2009年便于其离职演说中，提出[大地之母与人类普遍宣言]。同一届联合国大会亦于较早前由192个国家一致通过设立[大地之母日]，当中包含着人乃是大自然一部份这观点，而这两者应构成共生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与会许多支持动议的发言，均认为把人视为世界的中心，无视其他物种，包括无视地球本身，不过是浅薄的人类中心主义——这观点无疑带来了负面而举目皆见的生态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所谓地球的人类共善，却只能以人类作为实践的中介。只有人类的介入才能令地球自我更新——又或者只有人类的捕杀及破坏行为才能有效阻止地球自我复原。正是出于这缘故，地球的存亡，即生物多样性，直接关系到人类共善。我们要是使用[大自然的权利]

（Eduardo Gudynas, 2009）这说法，也只能以其第二种意思来掌握，因为只有人类才能违反或尊重那些权利，而无论地球又或者其他动物，都无法宣称对其权利的尊重。

需要对生态系统破坏负全责的，正是人类。在这意义下，法学家安东尼奥·沙林万卡（Antonio Salamanca）指出，根据法学观念 *droit titulaire or droit vicaire*（即[附属或次级法]），人类社群的行为必需照顾到能力有缺失者（例如动物、新生婴儿、严重智障者等），因为他及牠生命的再生产要人类的中介。这观点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令人类体认到他们自身的责任。如此扩阔这法学主体的概念，便能在不诉诸将地球及其元素个人化的基础上，讨论气候公义的问题。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人与自然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关连：不同阶级与地球的关系并不一样。这关乎到在资本主义逻辑中实践出来的权力关系。

无论如何，问题的核心是地球必需具持续性——亦即有能力保持其生物多样性——如此地球才能抵住人类各种行为而自我更新。我们亦可点缀大自然，以其丰富的植物资源来创造新的地景或花园，增添美感。地球是很慷慨的，即使存在着非可再生的元素，牠亦能造就各种生命

的生产及再生产。但上述所有都与剥削地球以获得更高回报是彻底的两码事。

伟大的东方哲学传统里，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是核心的思想特征。印度教及佛教传统中对所有生命的尊敬、关于轮回的信念及其所表达的生命统一性及延续性，便说明了这一点。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我们亦发现人类由泥土所创造的信念，后来承继了这意象的伊斯兰教亦有同样的元素。圣经将人呈现为大自然的守护者（创世纪 1, 26-28），即使圣经确认大自然的意义是要侍奉人类，但这显然不包括对大自然的破坏。关于创世纪的神话，非洲及美洲许多文化里的信念也相当接近。

对美洲的原住民，关于「大地之母」（Pacha Mama）的观念处于核心位置。她因为是万物之源而被人格化，有着各种人类的特征。大自然的其他元素亦被视为有生命，有其个人特质，又或是巫术仪式的祭品。2011 年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举行的气候高峰会，许多文本（包括会前的预备文件及会上不同团体及个人的发言）均超越了「大地之母」这意象的比喻性质，而赋予她有能聆听，能回应及能被爱等人类生命特质——及由此，她也有属于她的权利。最终的文件提出重新评估普及的智能及先祖的知识，呼吁我们「确认大地之母为生命体，而我们与之有着不可分割、互相依存、互为补足及灵性的关系」。透过许多原住民的宇宙观框架，文件强而有力地点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强调了这关系本身的母性（女性）特质。

当然，必需承认，面对资本主义的逻辑，即使伟大的东方哲学及远古民族的传统也难以抵挡其发展、高度都市化及无所用心的消费。不少都需要急速的转化自己，甚至从文化领域中消失，例如亚洲的中国及越南，以及美洲大陆及非洲的许多原住民。新自由主义更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强化这现象：挤身于这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已成为许多个人及群体的热切期待。曾经在欧洲从属阶级及基督教身上发生的事情（毕竟基督教正是首个遭遇资本主义的宗教），而正在世界其他地方不断重复。意识型态污染无比真切。

可喜的是，传统观念现今又一次被召唤，作为历史记忆、文化重建及身份确认的工具，能卓有成效地质疑资本主义逻辑。能够援引众多历史文化及其概念为社会重建作出贡献，总是值得自豪的事，当然需要留意堕进原教旨主义的诱惑，固守过去而忽视当下有着无处着力的危险。

对于「大地之母」（Pacha Mama）、盖楚瓦人（Quechua）的「过好活」（buen vivir），及爱玛拉族（Aymara）的「共同好好过活」（living well together）的参考便属于这个范畴。两者均是许多原住民的原初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具体历史处境，它们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宇宙观，亦代表着尊敬大自然及共享集体生活的实践。这点正可以启发当前的思考及社会组织形式，以至为这符号注入新生命。然而，成功却取决于是否能恰如其份地作出调整，如黛安娜·纪艾路加·苏阿雷斯（Diana Quiroga Suarez）所言，「转化提供机会让最优秀的传统和现代智慧互相结合，让知识及技术跟着大自然的节奏」（D. Quiroga Suarez, 2009, 107）。

这当然不意味着质疑大自然与人类之间必要的和谐，亦不是草率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看法：将发展纯然等同于无边无际的物质增长，并视剥削大自然乃是这种发展的必然副产品。这亦不排除某些哲学观点需要翻新，例如那些忽略其他物种、或忽略大自然自我更新的能力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低估或边缘化一些能对人类提出良性批判的文化，尤其针对资本主义逻辑所带来的剥削，或者消费主义模型里弥漫着的个人主义及其他由这模式衍生的行为。然而，必需承认不同的文化确实存在。若我们将所有必需实施的改变，纯粹描述为符号式的思维，将符号呈现为现实，则有可能与分析性进路较强、较为倾向将物理及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置于特定范畴的文化发生矛盾。

目前，这两类文化并存于世上。前者拥有丰富的表达形式，长于反映符号的力量及理念（尤其是与大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性。这类文化通常有相当具体的元素，能轻易地传译为知识、行为及政策。但要地球上不同角落的都市文化吸收这些宇宙观，却并不容易。第二类文化则已被化约为彻底的操作理性，甚至纯然的「超级结构」（或法国人类学家梅洛·哥德里亚（**Maurice Godelier**）所谓的「蛋糕上的樱桃」），不断强化资本主义逻辑，并为将其延伸得更无远弗界作出贡献；同时却不能否认的是它造就了大规模的知识增长，有效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及政治问题。在对抗为人类及地球带来各种灾难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以单一文化的语言来提出自己的立场，就显得相当不智。相反，这正是全方位实践交互文化主义的适当时机。

上文已提及过卡尔·马克思的贡献。他认为资本主义启动了大自然及人类之间人为的及机械性的分离。按资本累积过程的定义，新陈代谢的破裂就是人类为满足其需要而与地球发生的物质转换，最终导致非理性的实践浪费及破坏（*Capital, Vol. 1, 637-638, cited by Gian Delgado, 2011*）。由是，马克思认为，必需将物质能源的流动减少至对社会不同人都公平的程度，才能改变生活的质素。对他而言，只有社会主义能重新建立新陈代谢的平衡，及终止大自然的破坏。

提倡一种关于我们与大自然关系的新概念，将带来许多实质的后果。我们将分为几个类别而各举一些例子，包括：必需的禁止及约束、正面的倡议，之后将讨论对于国与国之间的政策意涵。

首先，我们必需取缔所谓「天然资源」的私有产权，例如矿产、化石能源及森林。这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不可能像现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般任由个人及企业占用——亦即是不能由漠视外在成本及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利益所占用。转型的第一步，便是国家需要收回其天然资源的主权。当然，这并不必然保证能与大自然建立健康的关系：国有企业以资本主义逻辑运作并不罕见，国家主权亦因而不必然意味一套尊敬（而非剥削）大自然的哲学。第二步将会是这部门的国际化，而必需的条件是相关制度（如联合国及其属下的机构）的实质民主：许多情况下，它们仍然受到强势的政治经济力量所影响。此外，所有人类行为的生态成本都必需列入经济计算，以抗衡排除外在成本的功利主义逻辑——这就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大自然的原因之一。

其次，将再生产生命所必需的元素（例如食水及种子）商品化，亦需要禁止及约束。此等共享的物品不能受商品逻辑所支配，而需要以其他方式处理——当然亦不必然指由国家处理，而可以归集体控制。具体而言，这原则包括阻止造成「明日沙漠」的单一种植，尤其是生畜饲料及农作燃料的种植。针对出口工业及农产品，按运输距离而征收的税项，能同时减低能源使用及海洋污染。诸如此类的措施应多提出。

其他正面的措施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应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推广有机耕种及改善农民农业，长远而言将会比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更有效率（**O. de Schutter, 2011**）。立法要求延长所有工业产品的「寿命」，将可能节省更多原始材料及能源，同时减少温室气体的生产（**Wim Dierckxsens, 2011**）。

最后，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以金融机构为本的局面，与尊敬大自然的原则互相矛盾，需要展开多条抗争的战线。当全球的经济都变得金融化的时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一众地域性的银行及私人银行，全部财雄势大。世界贸易组织所推广的全球经济自由化政策，由于没有将外在成本计算在内，亦有着各种环境后果。这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在这方面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具生态意识的国家之间的联盟，有能力影响这组织的决策。

众多国际公约的推广是另一重要的面向。举例而言，气候（坎昆）、生物多样性（波恩及名

古屋）、保护河流海洋及鱼类、废料（特别是核子废料）等议题均有国际公约。推进新范式里这方面的意识，将会是进步国家在国际上的集体力量的基础，亦应成为其国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考虑到到目前为止的生态破坏，其对于气候稳定性及地球自我复原能力的有害影响，核心的工作是以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来重新定义「人类共善」。这是集体良心的一个新因素，但与所有人都同等重视的程度仍相去甚远。从例如中国这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国家来看，外在成本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多大的重视，可见。社会主义的社会并不真正的将这方面纳入其规划。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会把这方面纳入为其政策的核心基础。

#### 4.2 重新强调生活必需的生产，强调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

就经济而言，范式的转变取决于将使用价值列作优先，而非像资本主义的规划般高举交换价值。我们所指的使用价值，是当某件商品或服务对某人的生活有作用，而不是单纯作为交换之物。市场经济的特色，正是将交换价值列作首要：交换价值对作为最高阶市场生产的资本主义来说，最高阶的市场生产里，就是其唯一的价值。无法转换成商品货物或者服务是没价值的，因为它不能为资本累积带来贡献，而资本累积却是整个经济的目的及动力所在（M. Godelier, 1982）。据这种看法，使用价值是次要的，正如伊士云·米沙劳斯所言，「如它能自我调节以符合交换价值的要求，它便能获得存在的权利」（Mészáros 2008, 49）。只要有人愿意付钞，或广告产生了人为的需要，又或在投机泡沫中产生的金融服务，任何物品即使完全没有用途（例如大规模膨胀的军费，或国际发展援助的大白象项目等）都可付诸生产。相反，强调使用价值将令市场照顾人类的需要。

事实上，所谓必需品乃是相对的概念，随着历史条件及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不变的原则是所有人都有权利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所需。这原则在《国际人权宣言》中有力地肯定了。然而，这不能在空中楼阁中达成，而需要恰当定义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环境。但相对性却又不能等同不平等，例如有人能根据阶级、性别和种族而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需要。不同层次的人类群体透过民主程序及能干的机构（例如国家及国际的议会，代议议会等），才能定义所谓需要的满足。这便可称为建立一个「伦理经济」，它遵守伦理要求而否定强势的交换价值，而后者既是资本积累的来源，亦是经济的终极目的——也因而成为唯一的价值。

要成就这种伦理经济，必定要挑战主要生产工具的私有化。这正是拥有资本财货者坐享决策权的原因，亦是劳动者之所以受资本直接（透过薪水）及间接支配的基础——所谓间接支配就是透过货币政策、国家债务、预算赤字、食品及能源价格的投机、公共服务私有化等。<sup>5</sup>工作条件日益恶劣（Jorge Beinstein, 2009, 21）及女性劳动——亦即生命再生产在所有方面的核心——的贬值，背后就是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彻底控制。然而，以完全的国家控制作为对抗完全市场化的力量，如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所证明，并不是理想的方案。集体控制有由合作社到市民组织等许多不同的形式。

由此观之，我们需要以另一完全不同的方法重新定义「经济」。不应该再停留于为满足生产工具的拥有者或金融资本而生产及累积利益，而是以确保地球上所有人类的物质、文化及灵性生活为目标的集体行为。建基于剥削而最大化利润的国家或世界经济是不能接受的；同样道理，单单为地球上较高购买力的百分之二十人口而生产货物及服务，纯粹因为没有足够收入和不生产附加价值而排斥了余下百分之八十，也一样不能接受。重新定义经济因此就有一种根本

<sup>5</sup>有估计指全球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是非正式的，这让组织工人变得更加困难。然而，目前已有不少新方法，例如隶属于尼加拉瓜国家工人联合会（FNT）的「自雇工人大联盟」（CTCP-FNT），

改变的意义。将使用价值列作优先——而这也涉及生产力的发展——与及采纳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对大自然的尊敬（就如我们马上会论及的论点：普及的民主及交互文化主义。这并不否定为满足新的使用价值而必需出现的交换，但前提是价值的在地获得 / 使用不能失衡，与及不能忽略过程中产生的外在成本。

[增长]与[发展]是有分别的：这似乎被新古典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忘却。一如天主教鲁文大学的让·菲腊普·比文斯（Jean-Philippe Peemans）教授所言，[累积的逻辑是唯一的发展逻辑]已经深嵌在我们的认识里。但新的进路已经逐渐露头角，而当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其中一种是援引拉丁美洲原住民的概念[过好活]（el buen vivir，或 Sumak Kawsay）。这是一个远为广阔观念，不仅与将增长视为目标的观念彻底相反，它更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Diana Quiroga, 2009, 105）。早在 1960 年代，对应当时已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罗马俱乐部已提出零增长作为解决方法。在五十年代的苏维埃，乌夫更·哈士齐（Wolfgang Harsch）已写下了他极具原创性的《不谈增长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Without Growth*）。

眼下，这观点再次受到关注，而且激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的沙基·拉陶治（Serge Latouche）早在 1990 年代已提出[去增长]的概念，并主要在欧洲的中产阶级启发了一连串减少消费及尊敬大自然的运动。诚然，这主题是积极的，而且解除[增长将解决所有问题]的迷思也是重要的，但潜藏其中的讯息其实颇为欧洲中心主义，适用范围亦只包括有能力消费的阶级。试想像，对着非洲的部族宣扬[去增长]将是多么的不恰当。[过好活]之类的观念，其实有着更广阔及更积极的意涵。受着佛教的影响，不丹有快乐的观念，这甚至被写进了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目标。这可能只是有如大海般的全球市场里的小岛，但他们针对当代社会的模式，率先发展出一套批判而显然更全面的观点。

将使用价值的排序置于交换价值之前，亦意味着重新发现地域的面向。全球化以全球的相互交往令人忘记在地亲近性的美好，无视外在成本及奉金融资本为尊，而其虚拟的性格正是经济领域最为全球化之处。地域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地点，亦是政治责任及文化交流的地点，而这正是引入另一类基本原则之处。需要的并不是把问题收缩到一个见征知着的小宇宙，而是从多方位去思考之，由在地单位至全球领域，每一面向均有其功能而无需摧毁他人。从满足在地领域各方面的需要而言，贸易也需服膺于更高的原则，例如食物主权及能源主权（Jean-Philippe Peemans, 2010）。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价值的法则奉商业化为尊，因而作物的出口被认为需优先于本地食用的食物生产。所谓[食物安全]的概念并不足够——因为粮食的稳定供应，完全能建基于破坏本土经济的贸易、建基于在全球不同地区的过度专门化、建基于贪婪地消耗能源及破坏环境的全球运输等的贸易。

按这思路，在全球的规模上迈向经济的地域化，是由资本的中心脱勾的积极进路，阻止全球其他地方（即使是新兴国家）被转化成边缘地区。从贸易及货币系统的角度而言，这也是积极的进路，因为它有助重新设计全球化的模式。

具体的措施极多，这里只能列举少部份。反面来说，金融资本强势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所有类型的避税港都必需消除，同样道理，银行的保密制度亦必需消除——这是主导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两种有力工具。此外，必需订立[托宾税(Tobin tax)]，从国际金融流动中征税，控制金融资本的力量。经过如厄瓜多尔曾进行的公正核数后，所谓[恶债]也必需废除。对食物及能源的投机炒卖亦不能容许。如上面文所论，按工业及农业产品的运输距离征税，能减低运输及滥用[比较优势]所造成的生态成本。延长工业产品的[寿命]，能减少原材料及能源的消耗，也能限制资本纯粹由于贸易而产生的利润（Wim Dierckxsens, 2011）。

许多正面的案例可以援引，从而说明社会性的经济可以建基于与资本主义式经济相当迥异的逻辑。无疑到目前，相比于寡头垄断的资本及其无远弗界的发展，这些案例都只属于少数，然而也有可能从多方面加以鼓励。合作社及民众信贷正是这种例子，必需保护它们免被强势系统所破坏或吸纳。对于区域性的经济措施，它们意味着远离经济逻辑的转化，但也必需防止旧有制度藉新的生产技术适应新环境——即作为国家经济与全球资本框架在更高层次的融合的手段。在食水、能源、运输、通讯、医疗、教育及文化等方面，还原被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了的公共财货，亦是关键的一步。这当然不意味着一切都收归国家控制，相反，应设立许多不同形式的公共及市民管理，以处理其生产及分配。

排他的个人主义、漠视维持人类生命条件的集体维度，我们正面临人类共同遗产被破坏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透过重新理解所谓「经济」，来重新定义人类共善，乃是当务之急。

### 4.3 重整集体生活：社会关系及制度的普遍民主化

就集体生活的范式及人类共善，我们第三个主题是普及的民主，不单在政治的领域，而是包括经济系统、不同性别及所有其他制度。换言之，必需舍弃纯粹的形式民主——通常它不过确立虚假的平等及暗渡陈仓地延续许多社会不平等。这工作涉及翻新关于国家的观念，重申包括个人及集体等各方面的人权。这涉及无区别地对待不同种族、性别及阶级的所有人类，一视同仁为重建社会的伙伴，确认不同人自身的价值及参与（Franz Hinkelammert, 2005）。

国家的观念处于在这问题的核心。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布宾中央集权的国家模式，抹平所有差异而建立原则上平等的公民，对于建立真正的民主，并不足够。从超越欧洲政治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它无疑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现已不能单单考虑对立的阶级，以及确认任何一个阶级或不同阶级之间的联合，有能力操纵国家并确保其利益；现在需要承认所有不同民族都同样活于一片土地，同样有权利坚持其文化，其乡关及社会制度。并不是要如新自由主义时代一些欧洲国家般，堕进某种将国家能力削弱的社群主义，也并不是要接受新无政府主义某些合理而大规模的抗争。更不是要如某些政治宗教般退回对浪漫过去的乡愁，以及如一些经济利益集团（跨国企业反国际金融机构）般，倾向欺压小规模的地团。我们的目标是要在这些不同维度的集体生活——国际、区域及在地——中达至均衡，充份确认其存在及设立各种参与的机制。

关于国家角色的讨论，不能不包括社会最边缘群体的状况：上千年以来不断被漠视的无地农民、低等的种姓及所谓贱民（*dalits*），以及被忽视了五百年的美洲及非洲原住民，而在他们当中，女性尤其受到双重的边缘化。司法程序，甚至宪法程序，即使都绝对必需，但都不足以扭转局面。种族主义及偏见在任何社会都不会突然消失，在这领域文化因素是一个关键，也可成为致力改善的目标。保护人民免受「全球市场」压迫，以及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社会政策，是过渡期的重要措施，而前提是这些措施并不纯粹被视为与制度变革无关的慈善行为。

将语言扭曲至脱离原来意义的情况亦需要被重视。右派是个中的能手：现在有许多人吹嘘所谓「绿色资本主义」。即使对求变的国家来说，「过好活」（*Sumak Kawsay*）等传统概念也必需按其真实的意义来分析，方能作为过渡到另一种集体生活的元素，否则就不过是现行系统的改头换面。现实的政治语境有助理解两者的差异及评价之。

对政治实体及社会运动之间的对话，民主的普及化也应起作用。成立以咨询及对话为目标的组织，尊重彼此之间的自主性，也属同一大方向的一部份。在波利维亚拉美人民阵线（*ALBA, Bolivarian Alliance of The Peoples of our America*）基本架构下的计划——社会运动议会（*Council of Social Movements*）是这方向上的一个原创性尝试。关于「民间社会」的概念，

虽然经常在有关的讨论里被提及，但意义仍然是含糊的，因为阶级斗争仍然会在这场域发生：事实上，存在着由下而上的民间社会，也有由上而下的。不加区别地应用这概念，有机会产生含混及目前一些无视阶级差异的社会方案<sup>6</sup>。拉丁美洲一众国家的经验展示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它们都参考同一普及民主的逻辑。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真正独立是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保证。另外，一个民主的国家也必需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亦即是权力部门不能受到宗教组织的干预，即使是主流宗教。这其实也是宗教自由的基础。但这却不表示国家应该否定宗教的公共面向（例如，解放神学的社会伦理面向），甚至乎，如「实存社会主义」的一些国家般，强行奉无神论为国家宗教。

其他的机构亦应参考这些指导原则。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是最不民主的，决策的权力聚集在几个人的手上。社会传播媒体也是同一原理，所有其他工会、文化、体育、宗教及社会组织亦然。

关于「非暴力」的观念，亦显然与普及化的民主有关连。人类社会中的所有矛盾，包括家庭内及国际层次的矛盾，都必需诉诸形式及非形式的非暴力机制来解决。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关于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概念是有危险性的，因它能为例如伊拉克、阿富汗及利比亚等的战争提供方便的借口。然而，虽然非暴力是值得追求的原则，事实上我们却活在一个充斥着暴力的社会。

暴力的发生，几乎无例外地都是由于追求经济及政治的霸权。从现代史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是导致暴力的主导因素，无论是内部资本的累积（例如，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又或者为确保一国能操控另一国，最终控制其天然资源（石油或战略性金属）。文化及宗教的论据，经常有意无意间，成为了人民或群众支持经济及政治冲突的意识型态的合法性根据。然而，文化及宗教论据也可成为受压迫群体为公义而抗争的非物质弹药。

在这意义下，战争无异于独裁者，代表着民主的失效，及追求人类共善过程的断裂。军事科技发展至今，当所有民主手段都被排斥时的人民抗争，已无所谓公义之战。然而，抗争的伦理及政治基础，需建立在对所有因素的整全社会政治及历史分析上。

对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的抗争当可列入这范畴，民主化大众传播媒体的行动，禁止金融资本操纵之，也属同类。非国家组织，例如政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文化及宗教组织等，也可透过确保民主运作（例如男女平等、责任更替等）的规条而获得公众认可（甚至经济支持）。

同一原则应用在国际政治层面，也有许多可能性。联合国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其众多部门，从安理会开始，便全然不民主；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尤其是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亦在此列。在这方向上的建设性工作，应将边缘群体的治理放于首位。虽然并非正式组织，但G8工业国集团及G20国集团却有实质的力量，必需被挑战。捍卫人权的法庭虽然值得追求，但都需要受制于同样的民主规格，以及处理更多不同领域事宜，例如经济罪行、「恶账」及生态破坏等。所有拉丁美洲的机构，例如南方银行（Banco del Sur）、区域性货币（the Sucre）及波利维亚拉美人民阵线等，与及其他洲的区域性机构，都在这意义下应被慎重对待。

资本主义对民主的破坏（特别在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所挑起的不平等，程度之高乃历史上前所未见。严重得令到许多社会在不同层面都组织起来，捍卫小众社群的利益。重新建立民主运作的普世范式，亦因而成了人类共善的核心支柱。

#### 4.4 确立相互文化主义，共建普世共善

<sup>6</sup>几年前，在波哥大（Bogotá）一个人口众多的小区，曾有一句标语写在墙上：「我们也有人权！」

文化维度的目标，是给予平等机会让所有形式的知识、文化、哲学及宗教能共同建设人类共善。这角色不应由西方文化独占，因它实质上等同于所谓「发展」的观念，消灭或边缘化其他所有视角。执行上，不单要求对现实的理解及期盼，更包括阐释人类共善所必需的伦理，包括自我激发为行动者的情感维度、美学及实践上的表达形式。多元文化主义当然包含采纳其他三大主题的组织原则：与大自然的关系、生命基本所需的生产、及广义的民主组织。同样重要的是意念及价值观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递。以平常人的语言来说话，以为人所理解的语汇表达自己，都是民主的基本要求。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却是不充份的。公开的相互文化主义亦都应被提倡，以强调文化间对话及交流的机会。文化并不是博物馆的收藏，而是社会上有生命的元素。内部及国际间的移民，关系到传播工具的发展，导致大规模的文化转变。显然不是所有都值得追求，但都有机会导致丰足。文化的生存需要物质基础及手段，包括不同形式的乡关、教育及传播媒体，亦包括各种文化表达的机会，例如节日、朝圣、仪式、宗教团体及建筑等。

接着就是设计多元文化国家的框架的具体操作。例如波利维亚及厄瓜多尔等国家，透过成立多元民族的国家，将概念翻译到宪法里，虽然在实际操作上不无困难。核心理念是国家有责任保证不同民族的基本文化活动，尤其是保护他们免受经济现代性及强势文化的攻击。为达至这目的，双语教育是重要的工具。此外，相互文化主义观念亦应影响通识教育，例如教授历史及重构目前被市场逻辑主导的教育哲学。出版廉宜的书籍、举办书展、工匠中心及互动博物馆等都是实用的方式。除了传递信息外，传播媒体的重要性亦在于传递价值观，前提是不得违反多元主义及民主的原则。促进不同的在地文化、抗衡垄断及摧毁少数几个国际机构的支配等，这些问题必需视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处理伦理问题的团体，例如捍卫人权的组织、不同类型的监察机构、宗教组织等，都必需有表达的机会。

文化包括灵性的维度，这是人类的特质——将人类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当文明正面临灾难时，这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放眼整个世界，到处都在寻找意义，重新定义生命的目的。灵性乃是超越物质世界及赋予意义的力量。灵性有许多来源，也必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脉络：缺乏物质及生物基础，灵性无以存在。人类是不可分割的：灵性的假设是，没有精神就不会有意义。某种灵性的文化观点无视人类的物质面向——对个体而言是身体，对社会而言就是经济及政治现实——这无疑是个概念的歪途，有简化（文化是变革的单一因素）及异化（对社会结构无知）之嫌。无论有没超自然力量作为参考，灵性皆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意义。这意义将被如何表达，取决于个别社会的社会关系，但它亦能为这些关系给出指引。灵性有许多轨迹及不同的表达，但范式的转变不能缺少灵性。

对世界的愿景、对现实的理解及分析、社会及政治建设的伦理、美学表达及行动者的自我激发等，都是替代资本主义及其文明观的方案所必需的核心元素。它们是新范式所有维度的一部份：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生命基本需要的生产、重新定义经济，和归根究底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的政治及集体组织。尽管有所差异，这些文化元素能为促成人类及地球存续所必需的改变作出贡献。

## 5. 作为全球目标的人类共善

人类共善，换言之，就是达到这四个目标后的情况，而每个目标都对人类在地球上的集体生活有着根本的重要性。透过政治力量保证及由主流文化所传递，资本主义所定义的目标并不可持

续，也无法确保人类共善。相反，它有违生命的存续（François Houtart, 2009）。现存的范式必需改变，让人类及大自然形成共生的关系，能取用各种物品及服务，让所有个体及团体能参与社会及政治的组织过程，让每人都有其文化及伦理表达：亦即实现人类共善。一般而言，这会是漫长、辩证而非线性的过程，也是众多社会抗争的结果。本文语境里，这概念的意涵 远超古典希腊哲学，及后来被文艺复兴所承继的「共善」概念（J. Sanchez Parga, 2005, 378- 386），亦超越天主教会建基于阿奎那（Thomas Aquinas）哲学的社会学说。

正因如此，完整的理论反省实属必需。一方面需要处理所有导致世界迈向系统性灾难的因素，也要处理崩坏中的历史模型；另一方面，重新定义新社会型构的目标，这社会型构尊重大自然，并有能力将确保人类生命定为共负的责任。如埃里克·都索（Enrique Dussel, 2006）指出，需要确保的是每个伦理主体（即每个人）的生命的生产、再生产及发展。这正点出了人类共善的意涵。人类发展的任何范式的终极参考都是具体现实中的生命，包括与大自然的关系——而这正是资本主义逻辑所否定的。

或有人会批评这过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事实却是，人类需要乌托邦，而资本主义却摧毁了人对理想的思考，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所谓「没有其他替代」）。故此，寻找人类共善无疑是乌托邦，其乌托邦在于目标并不已经出现，却可能出现在明天。所有宣称体现了乌托邦的政治及宗教统治最终都走向大灾难，但乌托邦却是对迈进的呼吁。<sup>7</sup>正是由于此，这并非简单「无杀伤力的乌托邦」（Evelyn Pieiler, 2011, 27）。数以十万计的社会运动、市民组织、政治团体等都体现了对乌托邦的渴望，他们以各种方式为与大自然更好的关系、为保护大自然、为农民及有机农业、为社会经济、为消灭不当的债务、为集体夺回生产工具，为工作先于资本、为捍卫人权、为参与式民主及为让不同文化的价值被确认而艰苦奋斗。世界社会论坛让这现实明晰地出现在眼前，新的全球社会意识逐步形成。

然而，过程将会是动态的，需要协调而连贯的全局视野作为基础，以建立足够强大的力量为目标，在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各维度逆转当前的强势系统，让人在行动中聚合起来。这正是「人类共善」希望表达的：贯彻的理论基础，让任何运动及任何社会及政治计划都在整体中找到位置。达成目标不能单靠几个为人着想的知识分子的努力，而需要集体行动：借镜前人的想法，尤其是被资本主义大肆攻击的那部份社会主义传统，再结合新的元素。而它的扩散亦不能依赖个别社会团体或者包办真理的先锋党，而是许多反系统的力量，为人类共善而斗争。当然，还有许多理论及策略问题需继续研究、讨论及实验。

## 过渡

本文无法仔细处理另一观念，但在此省察的环节还是值得简介一下：过渡。马克思在讨论欧洲由封建主义生产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移时，恰如其份地发展了这概念。这是「社会的一个特定阶段，社会再生产封建主义赖以建立的经济及社会制度，面对越来越大的困难，而需要在另一种制度的基础上重整自身，而这就成为新的存在条件的一般形式」（Maurice Godelier, 1982, 1, 165）。证据显示，这涉及漫长而非线性的过程，暴力的程度则按参与抗争的社会团体而定。许多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已走到其历史角色的终点，因一如马克思的观察，它已成为一个破坏自身存在基础——大自然和工作——的系统。正是这原因，萨米尔·阿敏（Samir Amin）论到「痴呆资本主义」；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才于金融危机其间，发表文章宣称我们正在目击「资本主义的终结」；米沙罗斯（István Mészáros）则指出其无能力确保「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持续（I. Mészáros, 2008, 84）。

<sup>7</sup>关于乌托邦，爱德华度·加瑞安奴写到：「我向前走两步，它却移开两步。我向前走十步，但水平线又后退十步。我永远都可向前走，但我也永远无法达到。乌托邦有甚么作用？正是：为了向前迈进」（引自 Maurice Lemonine, 2010）

当你能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正发生往其他模式的过渡，而气候危机能加速这一过程，我们也不能忘记改变乃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若没有社会抗争及权力关系的转化，这社会过程将不能完成。换言之，资本主义不会自行垮台，所有社会及政治抗争的聚合是垮台的前奏。历史教导我们资本主义有能力将其自身的矛盾，转化为积累过程的助力。在眼前的系统灾难的历史脉络中，发展关于过渡这概念的理论，将有助我们生产出工具来评估眼下的社会及政治经验。在不少政权已投入变革过程的拉丁美洲尤其如此，预示着廿一世纪社会主义的来临。

这概念亦也应用到一般演化中的特定过程。考虑到物质发展的具体处境，以及在社会经济及政治领域的实存权力关系，这关乎到在不失目标的激进性的前提下，如何辨别能达到理想结果（即另一种人类发展模式）的行动。以开采为本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它们产生巨大的生态及社会破坏，而工业本身亦很大程度受到资本的利益所支配，但进步国家却不能突然刹停这些经济部门。如委内瑞拉及玻利维亚等国家的情况所示，原因在（但不限于）于这些工业为新政策提供了经济支撑。转型的阶段将包括 1) 基于内部市场的需求，引入中长期经济政策；2) 执行更严格的生态及社会法律，制衡经济部门带来的破坏；3) 各种成本由用者自负；4) 推动国际间的立法，防止所谓「比较优势」的现象，即有利立法较不严格的国家。在如厄瓜多尔等较少参与到开采型经济的国家，可透过提出为期数月或数年的延期偿付，与不同的社会运动商议出过渡的计划。

援引这概念工具，需要防止让它成为向社会民主式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让步的借口——即接受发展生产力不能不采用资本主义的原则、工具及程序。正如在巴西的情况，即使其他领域都取得相当的进步，但这意味着强化最反对变革的阶级力量。又或者，在如中国及越南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出将无可避免延长过渡期的新社会差异。这便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的立场发展生产力？亦即是如何从人类共善的角度发展生产力？需要先发展甚么力量？正是这个问题，便难倒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二次大战后的一众进步政权；而这问题也是这些国家失败的根源，亦解释了大多数这些国家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定位。诚如哥德里亚（Maurice Godelier）在他于天主教鲁文大学授课时所说：「社会主义的戏剧性在于它以资本主义的腿学走路」。如 2010 年在北京人民大学一次亚洲研讨会中所提出，发展有机农民农业而不是推广出口导向农业的单一种植；又例如重组拉丁美洲的铁路网络，而不是采纳「南美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倡议」（IIRSA, Initiativ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of South America）。这些都是可建议的例子，其实尚有许多可以提出来推动真正的过渡，而不仅流于对现行制度的适应。

## 6. 迈向关于人类共善的普世宣言

人类共善概念的另一任务将会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预备一份普世宣言。当然，一份简单的宣言并不能改变世界，但却能在一个不断生长的计划下组织起推动变革的各种力量。它也能作为有效的教育工具，传播动员社会运动所必需的理论工作。它将与国际人权宣言同级——一项早在启蒙时期及「现代性」早期便开始的漫长文化及政治过程的结果，标志着个人的解放及人权的确认。这份于十七世纪末由法国及美国发展出来的宣言，我们知道它并不完美，尤其它起草的背景有着浓厚的西方中产阶级社会愿景。西方势力亦以之来建立它在全世界的霸权。它亦引来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以非洲人权宪章（African Charter of Human Rights）作回应，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类似回应。然而，它存在；它亦拯救了许多人的自由及性命，以及导引出许多为人类福祉有用的决定。它亦不断的改良，增加了第二及第三代的权利。虽然如此，要对应地球及人类眼前所面对的问题，需要新的均衡；不单需要将人权的观念扩阔，也需要根据新范式重新定义人类共善。

筹备新的宣言，将能成为社会及政治动员的媒介，创造新的意识及作为在国际层面汇聚社会及政治运动的基础。这当然会是长期的工作，但启动之已刻不容缓。不仅汇聚不同社会运动的世界社会论坛及汇聚不同政党的圣保罗论坛，能够为推广宣言作出贡献；个别国家也能够透过他们在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及联合国的代表推广宣言。这将会是一场政治斗争，但却是有价值的：必需透过革命重新定义人类在地球集体生活的新范式，而宣言则可视为革命的符号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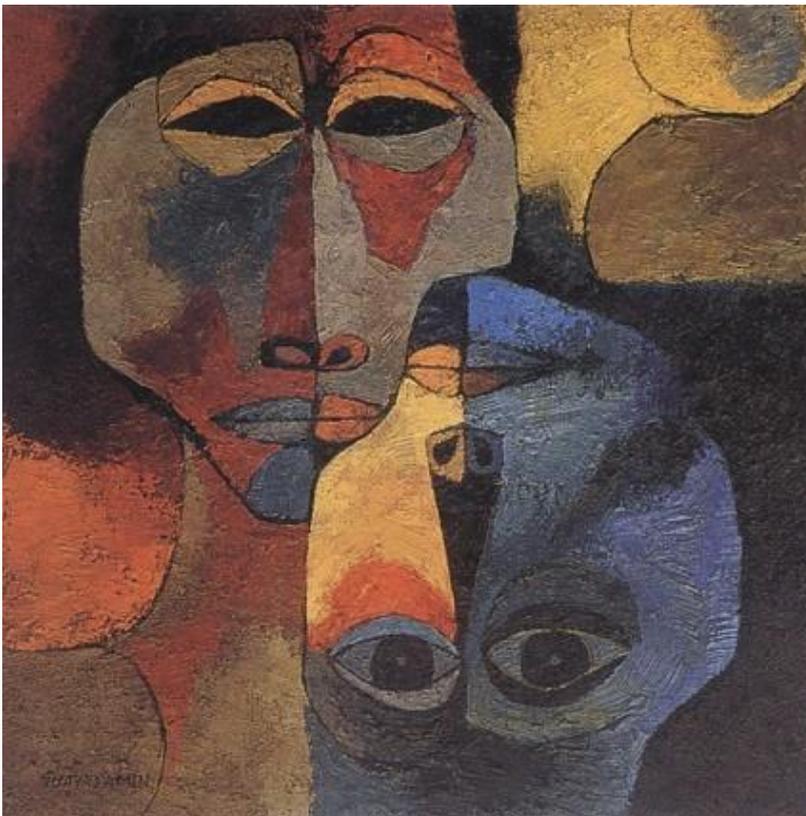
将捍卫例如食水的「公共财产」(common goods)，与重建「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优先性，以及建构新的「人类共善」(common good of humanity)的野心三者连结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人类共善的概念中体现的全局视野，需要如公共财产般的具体执行——如果它由抽象中诞生并需要翻译为行动的话。另一方面，特定的斗争，为了辨别其扮演的角色，必需在全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缓和系统失灵之处（及因而延长其寿命），而是为深远的转化作出贡献——这将需要谋求变革的力量聚集一起，从而建立人类及地球存续的基础。

## 7. 参考书目

- ACOSTA A. / MARTINEZ E (2009), *El Buen Vivir – Una vía para el desarrollo*, AbyaYala, Quito
- ALBO X. (2010) "Suma Qamaña, Convivir Bien. ¿Cómo medirlo? Diálogos, Year 1, No. 0 (August 2010), 54-64.
- AMIN S. (2003) *Le capitalisme et la nouvelle question agraire*, Forum du Tiers Monde, Dakar
- BEINSTEIN J. (2009), *El Largo Crepúsculo del Capitalismo*, Buenos Aires, Cartago, 2009.
- BOFF L. (2002) *El despertar del Águila*, Trotta, Madrid
- BRAUDEL F. (1969), *Ecrits sur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69.
- BRIE M. (2011) *Making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concrete*,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CARCANHOLO R.A. and SABADINI M. de S., "Capital ficticio y ganancias ficticias", in DIERCKXSENS W. et al., 2009.
- DELGADO G. (2011) *Metabolismo social y Futuro común de la Humanidad: Un análisis Norte-Sur*,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DE SCHUTTER O., *Eco-farming can double food production*, Geneva,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8 March 2011).
- DE SOUZA SANTOS B., *Refundación del Estado en América Latina – perspectivas desde una epistemología del Sur*, Quito, Abya Yala, 2010.
- DIERCKXSENS W. et AL., *La gran crisis del siglo XXI – Causas, Carácter, Perspectivas*, San José, DEI, 2009.
- DIERCKXSENS W. et al., *Siglo XXI, Crisis de una Civilización*, San José, DEI, 2010.
- DIERCKXSENS W., *Población, Fuerza de Trabajo y Rebelión en el Siglo XXI*, text prepared for 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 and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t Dakar, [www.Forumalternatives.org](http://www.Forumalternatives.org) (2011).
- DUSSEL E. (2002) *Philosophie de la Libération*, L'Harmattan, Paris
- ECHVERRIA B. (2001) *Las Ilusiones de la Modernidad*, Quito, Trama social, 2001.

- FORNET-BETANCOURT R. (2011), *La Philosophie interculturelle*, L'Harmattan, Paris
- GEORGE S. (1999), *The Lugano Report*,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 GODELIER M. (1982), "Transition", i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UF, 1982.
- GUDYNAS E., *El mandato ecológico – derechos de la Naturaleza y políticas ambientales en la nueva Constitución*, Quito, Abya Yala, 2009.
- HERRERA R. (2008), *Un autre Capitalisme est possible*, Paris, Syllepse
- HERRERA R. (2011), *Réflexions sur la Crise et ses Effets*,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HERRERA R. / NAKATANI P (2009), "Las Crisis financieras, Raíces, Razones, Perspectivas" in DIERCKXSENS et al., 2009
- HINKELAMMERT F. (2005), *El Sujeto y la Ley. El Retorno del Sujeto*, Caracas, Ministerio de Cultura
- HOUTART F. (2009) *El camino a la Utopía desde un Mundo de Incertidumbre*, Panama, Ruth Casa Editorial, Havana, Instituto cubano de Investigación cultural, Juan Marinello
- HOUTART F. (2010), *Agrofuels: Big Profits, Ruined Lives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Pluto Press, London
- KOVEL J. (2007), *The Enemy of Nature –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 LATOUCHE S. (2010). *Sortir de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Actes Sud
- LEMOINE M. (2011), "A quoi sert l'Utopi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 MAFFESOLI M. (1988) *Le Temps des Tribus*, Paris, Méridiens Klincksiek
- MERCIER-JESA S. (2008) 'Besoin' in Bensussan G and Labica G. (1982),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UF, 96-100.
- MESZAROS I. (2008) *El Desafío y la Carga del Tiempo histórico – 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Buenos Aires CLACSO, Caracas, Vadell
- MOLINA MOLINA E. (2010) *Vigencia de la teoría general de Keynes*, Havana, Ed. De Ciencias Sociales
- NUNEZ O. (2011), *La Economía social solidaria en las Naciones proletarizadas y el Proletariado por Cuenta propia en la Transformación del Sistema*, Managua
- ORTEGA J.(1995) "Identidad y Posmodernidad en América Latina", *Socialismo y Participación*, No. 70
- PETRELLA R. (1988) *Le Bien común – Eloge de la Solidarité*, Labor, Brussels
- PIEILLER E. (2011), "Dans la caverne de Alain Badiou",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 PLEYERS G. (2010) *Alterglobalization – Becoming Actors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The Polity Press
- QUIROGA D. (2009) "*Sumak kawsai*, Hacia un nuevo pacto en armonía con la Naturaleza", en ACOSTA A. *et al.*
- RUIZ DE ELVIRA M. (2010) "El gran hermano de los Barcos", *El País*, 15 December
- SALAMANCA SERRANO A. (2011), *Teoría Socialista del Derecho*, Quito, Ed. Jurídica del Ecuador (2 vols.).

- SANCHEZ PARGA J. (2005). *Poder y Política en Maquiavelo*, Homo Sapiens/CAAP, Quito
- SOUTH CENTER (2008) *Food Autosufficiency, Energy Crisis*, Geneva
- STERN N. (2006), *Report on the Economy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The Treasury
- STERNKELL. Z. (2010) "Anti-Lumières de tous les pays",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 STIGLITZ J. (2010) *The Stiglitz Report*, The New Press, new York, London
- VANDEPITTE M. (2011) *Redirecting Production for Life's Necessities, Prioritizing Use Value over Exchange Value*,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 WALLERSTEIN I. (2000)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 A Long 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15 (2), 251-267. June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布  
鲁塞尔办公室 Avenue  
Michel-Ange 11  
1000 Brussels  
Belgium  
电话: +32 (0)2738 7660  
传真: +32 (0)2738 7669  
电邮: [info@rosalux-europa.info](mailto:info@rosalux-europa.info)  
网页: [www.rosalux-europa.info](http://www.rosalux-europa.info)